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Edited by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xix, 249pp.**

近年來，學界引介「新清史」這個術語以指稱自1990年以來，對滿洲帝國在中國與內陸亞洲之歷史的一種廣泛修正。這可被稱為「中國研究的族群轉向」。首先，長期以來的漢化假定遭到了懷疑。在人類學觀點的運用下，學者重新檢視滿洲、蒙古、回、苗與其他民族在歷史脈絡下的身份認同；其次，漢人自我中心的概念也受到重新檢視。中國在歷史上被視為一脈相承且從未改變的一般看法受到了質疑。例如朝貢制度被視為是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一般模型，但是從清朝對待鄰國的方式包括了政治婚姻、宗教贊助、商業、外交與戰爭等取向來看，都與朝貢或漢人自我中心主義無關。

在此一背景下，本書《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內陸亞洲帝國》聚焦於清朝與內陸亞洲之間的關係及其政治與文化基礎。清朝既是一個內陸亞洲式的帝國，也是一個中華式的帝國。此一雙重性格透過檢視承德的發展歷程，可以略窺一二。由於位處中國北方邊疆，基於戰略考量，承德在實際上與象徵上成為滿洲統治者協調中國、俄國與內陸亞洲三者關係的指揮中心。自1703年起，康熙皇帝開始在承德興建避暑山莊。1703—1790年間，承德的景觀（landscape）逐漸改變，滿洲統治者藉此反映與頌揚清朝在中亞與內陸亞洲的擴張。避暑山莊與外八廟整合了中國、西藏與中亞的關鍵文化遺跡。承德的一切都證明清朝化解了農業中國與遊牧內陸亞洲的衝突。

1708年，康熙皇帝正式將承德的夏宮命名為避暑山莊。精心設計的自然環境是這座山莊的主要吸引力所在。康熙與乾隆皇帝在避暑山莊週邊各營造了三十六景，並且留下刻石與詩詞以誌之。除了有中國內地的景色外，也有其他表示蒙古、中亞與西藏等外部邊疆的景色。透過重建從西藏到江南的著名景點，避暑山莊成為滿洲帝國的縮影。

無獨有偶，透過對不同歐亞政體的比較，可以發現類似的歷史過程。中國的承德和法國的凡爾賽兩座都市一樣，都是由強有利的王權所建立，並透過積聚文化資源以進行中央集權。而法王路易十四、印度蒙兀兒帝國的阿克巴皇帝與清朝的乾隆皇帝，三者同樣從都市中心遷移到鄉間建立新首都，且這三個專制君王皆意圖藉此展示其皇權並鞏固之。

然而，自1820年嘉慶皇帝駕崩後，新的地緣政治挑戰使得清朝忽略了承

德。時至今日，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蹂躪後，承德被復振為大眾旅遊景點，一個帝國主題樂園，為新中國多民族與多文化政體的國家遠景而服務。從君主專制到共產政權，承德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在不同的時代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就架構而言，本書集結了11篇論文及6篇與承德相關之史料的英譯，共分為五部份：第一部份「作為內陸亞洲首都的承德」，提供了與本書相關之清朝歷史背景的簡介；第二部份「帝國的儀式」則檢視承德如何與相關的木蘭獵場以帝國首都的形式運作。第三部份「皇帝的多重面孔」，則是研究乾隆皇帝在多樣化的媒介與文化模式中的表現。同時使用不同帝國成員的語言是大一統皇帝的表現。第四部份「來自承德的聲音」，則集結了與承德相關的御製詩文、西方傳教士書信、班禪朝見乾隆皇帝的藏人記載以及承德的民間故事等。從其來源包括了漢文、滿文、法文與藏文的情況看來，來自承德的聲音實充滿了民族與文化的多樣性。第五部份「今日的承德」則討論了在清朝崩潰後外國探險家重新發現承德的經過，以及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承德如何為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理想服務。

由於本書為論文集，相較於稍早出版的《圖繪承德：清朝的景觀事業》（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其結構較為鬆散。但是兩書着眼點並不完全相同，後者主要是針對承德之自然與人文景觀的改變進行研究，而前者則主要是針對清代在承德所發生的歷史事件與其意義，以及對承德景觀的多重文化特色進行分析。兩者的內容實有互補之處。限於篇幅，無法進行各篇論文的通盤討論，以下僅針對數篇論文進行討論：

1. 透過對承德建築的考察，Anne Chayet發現在承德所建造的西藏廟宇，並非以真正的西藏佛寺為藍本，而是以佛教唐卡為藍本而建造的。（頁45）唐卡畫中想象的西藏佛寺，在皇帝的權力下化為真實。避暑山莊的建築形式，正反映了清朝的國家性質，它無法被簡單歸類為傳統中國式、蒙古式或西藏式，而是上述三種的特別混合形式，應稱為「清式」建築。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建築風格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清帝國的複雜性與特殊性。

2. 在Van J. Symons的論文中，統計出乾隆皇帝一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待在承德。他並且將乾隆皇帝從北京到承德的旅程比擬為帝制中國傳統中的「巡狩」（a “tour of inspection”）。Symons藉由此舉說明了乾隆皇帝不僅是有意識地以漢人模式的儒家君王自居；同時，乾隆前往關外圍獵與宴請外藩臣屬又暗示了他同時也以內陸亞洲的大汗自居的目標。

3. Mark C. Elliott與Ning Chia的文章則討論狩獵在內陸亞洲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並且延伸討論狩獵對清朝皇帝的政治意義。本文將木蘭圍獵視為一種被發明的傳統，不同於滿洲人舊有的打獵風俗，並討論其成為清朝皇室家教祖制之過程與意義。此外，木蘭圍獵對於清帝與漢官而言，存在着不同的意義：前者視其為光榮的民族傳統，後者則視其為皇帝沉溺遊樂的象徵。這種詮釋上的差異，也提醒讀者注意滿洲人統治下的阿爾泰與漢人世界仍舊存在的鴻溝。

4. 1771年，土爾扈特蒙古自俄國前來歸順清朝。乾隆皇帝認為這個歷史事件是自清朝建國以來經略內陸亞洲的頂點，因此作了〈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以紀念之。James A. Millward以此為背景來探討清朝在平定準噶爾蒙古後，乾隆皇帝以盟旗制度統治蒙古的意義。由於蒙古人過去的部落被地理劃分的實體所取代；而原先對卡里斯瑪魅力領袖的忠誠也改為臣服於由多層次的科層制行政體系所環繞的皇帝。Millward認為這些改變不僅防止了廣泛部落聯盟的可能性，也避免出現新的卡里斯瑪魅力領袖來挑戰清朝的權威，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內陸亞洲草原有效地與世隔絕了。可以說，清朝的治蒙政策有效地使蒙古臣服清朝的統治之下。這種情勢一直到清末在蒙古推行新政，引起蒙古貴族與喇嘛的不滿，加上俄國的介入，清朝在蒙古的統治才瓦解。（有關清朝在蒙古統治的瓦解過程的討論，參見Mei-hua Lan,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A Pan-Mongolian Endeavor*.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5. Joseph A. Adler以承德文廟的興建為例，說明乾隆皇帝跳脫了程朱理學的傳統，並以古典儒家理想中的聖王自居。藉此，不僅儒士官僚失去了批判皇帝的理論基礎，皇帝也鞏固了清朝統治關內漢人的道德正當性。

6. 有關乾隆皇帝對藏傳佛教的信仰究竟是出於真誠還是為了綏服蒙古的問題，Elisabeth Benard以記述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藏文材料為基礎，以及對乾隆皇帝陵寢的分析，試圖說明乾隆皇帝對藏傳佛教的追求不僅僅是出於策略，更包含了他個人對藏傳佛教信仰的虔信。

如果我們從帝國邊緣的承德來反觀清朝的歷史，可以發現這個規模不大的新興城市，在清朝歷史上實佔有重要地位。1689年，康熙皇帝在木蘭行圍期間，和俄國簽署了〈尼布楚條約〉；隔年在木蘭圍場附近的烏蘭布通，由康熙皇帝所領導的清軍擊敗了噶爾丹的入侵。1691年，康熙皇帝在多倫諾爾接見了前來歸順的喀爾喀蒙古王公。80年後，1771年，乾隆皇帝在承德接見了自俄國來歸清朝的土爾扈特蒙古領導者渥巴錫（Ubashi）。1780年，乾隆

皇帝與西藏重要政教領袖之一的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貝丹益希於承德會面，並在萬樹園設宴款待之。另外在本書中未着重探討的部份，還包括了1793年乾隆皇帝在這裡接待了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喬治勳爵馬戛爾尼（George Lord Viscount Macartney）。這些清朝歷史上的重要事件都與承德息息相關。我們必須承認，外國政要也許對承德比北京更為熟悉。承德不僅是當時內陸亞洲的首都，更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

清朝皇帝從北京巡狩至承德，建文廟以修文，行圍獵以講武。在藏傳佛教領袖的賜福、蒙古王公的臣服與儒士漢官的協助下，清朝皇帝得以成功統治廣大的滿洲帝國（Manchu empire）。透過這本書所提供的承德邊緣視角，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清朝皇帝維持帝國一統中的作用：名為避暑，實為柔遠；圍獵為名，講武是實；宴請來使是象徵，宣示主從關係為意義；崇尚佛教是手段，籠絡蒙藏為目的。承德不僅是清朝大一統帝國的象徵縮影；反過來，它也在清朝維持大一統的過程中起了實際作用。從承德這個制高點往下俯瞰，當可使我們更清楚清朝在維持多民族帝國統一上的細膩之處。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清朝的大一統並非文化的大一統，而僅是政治上的大一統。事實上，承德景觀之混合文化特色與清朝基於族群主權所實施的各種民族隔離與地域封禁政策之間，存在着極大的落差。（有關清朝的民族隔離與地域封禁政策，參見馬汝珩、馬大正編，《清代的邊疆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但似乎少有相關研究討論此一落差的意義。針對治下的不同民族，清朝皇帝「因其教，不易其俗」，尊重其文化與信仰，但同時也實行各民族之間的隔離政策，而自己則以唯一得以跨越不同民族文化藩籬的統治者自居。這也是作為征服王朝的清朝與典型中國王朝在帝國建構上的差異之一。

蔡偉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周大鳴，《鳳凰村的變遷：《華南的鄉村生活》的追蹤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349頁。

我最早接觸葛學溥（K. U. Kulp）的《華南的鄉村生活——家族主義的社會學》一書，還是在中大攻讀文化人類學碩士研究生的時候，之後我利用他書中提出的有關家族的四種類型的學說以及之後的漢族家族研究的狀況，